■战略视角

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特点

□门洪华

一个国家总是按照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来制定外交政策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外交也进一步体现出积极、合作、有所作为的姿态。中国领导人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以“机遇论”、“贡献论”对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论调做出积极回应。这样的认识成为中国外交思想演进的驱动力，成为多边主义与双边协调相辅相成之外交战略的思想基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进一步体现出新气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更为活跃的角色。

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定位有了更为辨证的认识，总体战略目标也更为明晰可行。一个国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综合国力，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映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其国际地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以此为基础，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营造并维护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和平、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提出新安全观并付诸实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日益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领域。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应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维护东亚安全的最终目标。为此，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付诸实践。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采取积极战略，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机制，参与新国际机制的制定，主动促成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并在亚洲区域国际机制的建设中承担主导者的角色。中国正在亚太地区发挥着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经济发展主发动机的作用。

立足邻近区域，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这样的战略态势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现实基础。而且，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一贯有着良好的记录，这为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历史基础。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在经济上，中国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调“10+3机制”可以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以逐步建立起区域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参与亚洲地区主义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范式，中国加强了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综上所述，在世界上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已成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显著特点。这一战略转变以经济主义和区域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在安全问题上，中国采取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安全战略，强调自我约束和安全合作。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意义

□刘力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迅猛发展。根据统计，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各自为102893亿元、6208亿美元和8010元，分别是1976年的35.0倍、46.2倍和25.3倍。199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6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下中等收入国家。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国民经济福利和社会进步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状况的综合指标。按照该机构发布的《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26，是1980年（0.475）的1.53倍，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发展指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自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但其全球意义恐怕都难以与中国经济的崛起相比肩。之所以下这样的论断，其原因主要不在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之快，而在于中国是拥有世界1/5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3》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人口占所有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的25%，占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48%，占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59%，相当于所有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2.52倍和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口的1.33倍。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使1/5世界人口，1/4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近3/5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从中直接受益，这一受益人口还相当于2.52倍的所有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口的和1.33倍的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口。因此，中国的经济崛起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做出贡献

根据统计，1990年世界有近13亿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1美元，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世界银行在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先后在1990、2000和2004年3次把贫困问题作为主题。2000年联合国召开的千年首脑决议通过的国际发展目标，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其首要目标，要求到2015年使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为解决贫困问题，国际社会制定了许多战略，采取了种种措施。这些战略和措施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的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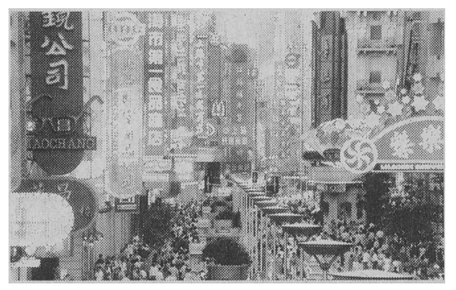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2004》提供的数据，1990-2000年，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数，由1990年的12.37亿人减少到11.00亿人，比重由28.3%下降至21.6%。但是，这主要归因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南亚地区略微减少）。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贫困人口由4800万增加到5600万，中东和北非的贫困人口由500万增加到800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由2.41亿增加到3.23亿。

显然，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基本上来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而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情况，可以发现，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2000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人口由4.70亿下降为2.61亿，10年间减少了2.09亿。其中，其他国家减少了0.53亿，其余的1.56亿贫困人口的减少均来自中国的贡献。从比重来看，中国贫困人口减少数占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贫困人口减少总数的74.6%。也就是说，无论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还是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的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1990年的8.77亿增加到2000年的8.96亿。

上述似乎很枯燥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为世界贫困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正如2003年2月1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驳斥“中国威胁论”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使“13亿中国人免受于过去可怕的贫困”。这是中国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持续稳定性。那时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年均波动幅度很小。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呈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特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7-8%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1997-2002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和其他各类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而且年均波动幅度也较小。



随着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其经济的稳定增长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十分有利的。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将取代日本成为亚军。1980至2000年间，中国贸易和服务增长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为4.7%，美国和日本的贡献率分别为14.4%和6.9%。又据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的“2003年预测”报告中称，中国在2002年全球GDP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分别作出了17.5%和29%的贡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显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性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之，作为拥有世界1/5以上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利于缓解世界贫困问题、优化世界经济格局和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今后，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对人类的上述贡献将会越来越突出。

■信息与动态

约瑟夫·奈：用“新帝国论”指导美外交十分危险

近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新加坡《海峡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美国真的是帝国吗？》的文章。

约瑟夫·奈认为，30年前，激进的左派使用“美帝国”这种称谓，如今，这个词再次出现并用它来阐释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许多方面来讲。很容易将美国比作帝国。美国的军队在全球具有影响力，世界各地都有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地的指挥官有时就像殖民地的总督。美国的经济实力居全球首位，美国的文化则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别的国家。但是将首屈一指的地位与帝国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约瑟夫·奈指出，美国当然不是19到20世纪的欧洲帝国那种意义上帝国，因为那种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政治实力。虽然美国和弱国之间当然存在不平等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助长剥削，但是如果没有正式的政治上的控制，那么使用“帝国”这个词不仅不准确，而且会令人产生误解。当然，与巅峰时的英帝国相比，美国现在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但是美国的权力（从对其他国家内政的控制这个意义上讲）不如当年的英国大，因为英国当初统治了1/4的世界。美国如今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去年，美国甚至不能让墨西哥和智利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再次作出决议。

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全球化时代，战略力量根本不会高度集中。相反，它像复杂的三维棋局那样分散在各个国家之间。在棋盘的顶层，美国的军事实力基本上无人匹敌；但是在经济这层棋盘上，美国并非霸权或帝国，举例来说，如果欧洲联合起来，美国想和它平起平坐也绝非易事；在位于底层的跨国关系棋盘上，权力被杂乱无章地分散，使用单极、霸权或美帝国这样的字眼毫无意义。

因此，那些根据美国的军事实力主张奉行帝国外交的人被误导了。在三维棋局中，如果只关注某一层棋盘，而没有注意到其他棋盘以及各棋盘之间的垂直关系，那么就会满盘皆输。反恐怖战争就是个例子，美国通过位于顶层的军事行动棋盘推翻了伊拉克的暴君，但与此同时，在底层的跨国关系棋盘上，“基地”组织招募新成员的能力也随之增加。这些问题代表了全球化的阴暗面。它们本身就带有多边色彩，而且要通过各国的合作才能得以解决。所以将美国称为帝国没有抓住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的实质。

约瑟夫·奈认为，那些极力鼓吹美帝国论的人也误解了美国舆论和机构的本意。美国公众会容忍帝国的角色吗？马克斯·布特等新保守派主张，美国应该像自信的英国人当年所做的那样，向麻烦缠身的国家提供开明的外部管理。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指出的，现代美国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因为“它的帝制向来不能长久”。

一个世纪以前，当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时，它曾短暂地成为真正的帝国主义力量，但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与英国不同，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给美国人带来舒服的感觉。只有一小部分军事占领行动最终直接导致了民主政权的建立。

约瑟夫·奈认为，经济是决定美帝国的唯一因素：与今天相比，美国在冷战期间用于军事开支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得多。相反，之所以认为美国的帝国气十足，是因为它要在众多周边国家充当警察的角色，而这些国家的数量之多是美国公众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不应用帝国这种比喻来指导其外交政策。帝国，无助于美国理解和应对它在21世纪信息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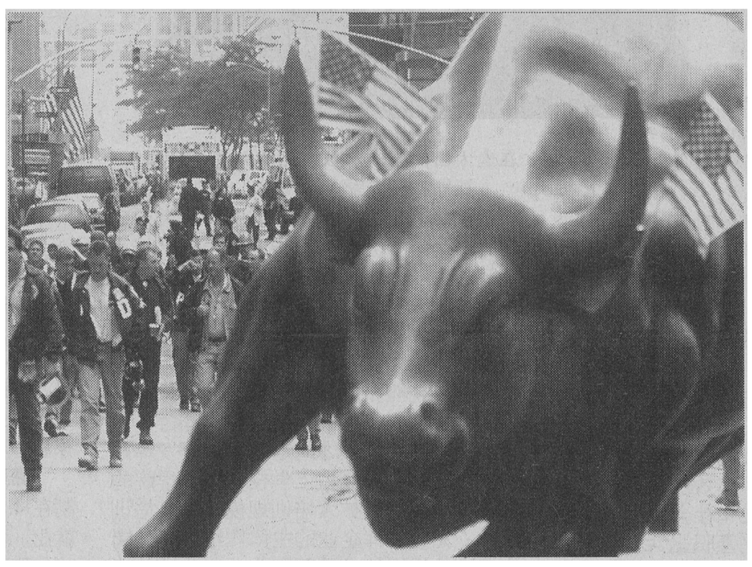
更　正

本版2月16日刊登的“塞缪尔森分析美元汇率下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文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系编辑误加。此文作者是罗伯特·塞缪尔森，并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环球瞭望

美国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

从本期起本报将在“环球瞭望”栏目里陆续介绍外国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系列文章，供读者参考。



□董艳玲

1980年代，美国银行业由于经济衰退、金融管制放松和内部管理不善等原因产生了巨额不良资产，并因此陷入了19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困境。1980-1982年间以及1986年以后，美国银行业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破产风潮。1980年，美国仅有10家银行破产，到1988年，破产银行数量增至200多家，有问题的商业银行总数超过了1400家，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7000多亿美元。从1980年到1990年，美国破产的银行数量总计1331家。美国银行业税后净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从1981年的13.1%降到1990年的7.7%，所占的全球份额从1984年的26.7%跌至1992年的10.2%。面对日益深化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和银行业采取了积极果断的措施，在6年左右的时间内成功地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美国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措施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政府的主导作用；二是处理不良资产方式的创新与多样化。

美国政府的主导作用

美国政府对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极为重视。为了化解银行危机，维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美国政府从全局出发，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1. 建立专门机构。面对储蓄信贷机构（S&L）爆发的大规模破产风潮，美国政府于1989年8月成立了隶属于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临时性政府机构RTC（重组信托公司），专门负责接管和处理经营失败的储蓄信贷机构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FDIC从1980年到1994年的15年中，共处理了1617家破产金融机构，总资产高达3026亿美元。而RTC经过6年零4个月的运作，共处理了747家储蓄信贷机构，处理资产的账面价值达4580亿美元，占移交资产总额的98%，累计资产净损失为879亿美元。1995年12月RTC解散时，美国的储蓄信贷机构恢复了正常运营。美国RTC开创了设置专门机构处理不良资产的先河，其成功经验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效仿。FDIC和RTC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介入，加快了美国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步伐，减弱了银行倒闭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

2. 制定相关法律。为了保证处理不良资产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美国国会在1989年通过了《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随后又颁布了《RTC再融资、重组与改良法》、《RTC完成法》等一系列新的银行法案，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RTC的目标、权利和责任。例如，法律赋予RTC三项目标，即争取最高的净现值回报；尽量减少资产清算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尽量增加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应量。再如，法律赋予RTC除具有公司的一般权利之外，还有如下特权：发放贷款、发行证券、出面组织联邦储蓄协会、组建过渡性银行等。这些法律的出台为RTC公正有序地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1991年，美国国会又颁布实施了FDICIA法，要求监管当局将银行资本分为五级，并对银行业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

3. 实施特殊政策。1989年6月，针对利率上升给存款机构造成的巨额损失，美联储开始实行国家指导下的低利率政策，执行将真实利率降低到零水平的金融缓和政策。金融缓和政策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增强了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能力。同年8月，美国政府实施了对金融机构的援救性措施，一是美联储向银行提供低息融资，银行用这些资金购买国债，再以利差所得净收益核销不良资产；二是政府以公共资金直接购买银行不良资产。从1989年成立到1995年解散，RTC共动用了12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财政负担也从1989年的91亿美元和1990年的465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507亿美元。

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具体方式

美国政府机构RTC和FDIC以及大商业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七种具体方式：

1. 出售资产。根据资产的规模、质量、期限、类型和地区分布等将资产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开拍卖、暗盘投票或折价整批出售等方式将大批不良资产出售给债权收购公司或其他企业和个人投资家。出售的资产主要包括不良贷款和不动产两类。

2. 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委托民间企业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合同价款主要包括管理费、资产处置费和激励报酬三个部分。一般情况下，管理费和资产处置费由委托方和被委托方在招标过程中协商确定，而激励报酬则由委托方根据被委托方在特定的期限内完成资产处理和清算的情况加以确定。

3. 资产证券化。RTC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于1990年将34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从而将不良资产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用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关键在于要有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

4. 股本合资。由RTC与民间投资者共同组成合资公司（或基金）。其中，RTC以其所持有的破产金融机构的资产作为股本投入，并负责安排融资；民间投资者向合资公司注入现金股本，并提供资产管理服务。资产清算所获得的现金收入首先用来清偿RTC所持有的债券，余下的收入则按照投资比例由RTC与民间投资者共同分享。

5. 提取呆账准备金。美国法律规定，对于不同类别的资产分别提取不同比例的呆账准备金。呆账准备金不包括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之内，因此不能用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其用途仅限于冲销不良贷款损失。

6. 调整债权结构。银行全面控制企业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本金支付等条款，掌握相关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根据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程度，与债务人重新协议贷款条件，或延长贷款期限，或减免利息，或追加担保和资产抵押，或直接向企业派驻观察员。通过调整债权结构，可以增加贷款项目的潜在价值，提高银行的优先清偿地位。

7. “好银行+坏银行”模式。与中小金融机构不同，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在危机中没有请求政府机构的介入和救助，而是创造了“好银行+坏银行”等解决不良资产的新模式。“好银行+坏银行”模式是将银行不良资产从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划拨出去，移交给单独成立的子公司。母银行由于转让了不良资产而成为资产优良、资本充足的“好银行”，而子公司则由于接受了不良资产而成为“坏银行”。一般情况下，“坏银行”的经营业务要受到许多限制。“好银行”和“坏银行”的分离减轻了不良资产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这种模式的“坏银行”有时也指政府部门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